刘熙载的思想、学术及其他

徐林祥

(扬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2)

摘要:晚清学者刘熙载在上海龙门书院的著述和教学实践,更多地表现出儒家“圣贤之道”的影响;在晚年刘熙载身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学者与道、释消极遁世观相异趣的积极的入世观、致用务实的精神和修己安人的社会理想。刘熙载的研究领域涉及经学、文艺学、文章学、语言学、教育学,甚至数学、天文学等方面。刘熙载以其在上海龙门书院的教育实践应和了中国近代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

关键词:晚清学者;刘熙载;上海龙门书院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030(2014)01-0063-08

长期以来,人们对刘熙载的主导思想是儒、还是道、或是佛,一直有争议;对他的政治态度,一般都认为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封建守旧派;对他的学术贡献,大多只知其《艺概》,称之为文学家或文艺理论家;至于他的教育实践,则更鲜为人知。笔者以为:有必要重读刘熙载,重新认识刘熙载,重新评价刘熙载。

一、刘熙载的主导思想

关于刘熙载的主导思想,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许多学者都持道家说或佛家说。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假若对他的思想加以定性分析的话,那基调却是老庄,加上佛”^[1];“道家老庄哲学对他影响已很深”^[2];“刘熙载的文艺美学思想深受佛门思维理念的影响浸润”^[3]。

确实,刘熙载自幼年起在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同时,受到过佛老学说的浸染。他的《昨非集》中就有一些反映佛老思想影响的诗文。刘熙载的父亲刘松龄是一位地方上颇有声望的隐君子;少年刘熙载10岁丧父,数岁复丧母,茕茕靡所依;青年刘熙载曾师从兴化文正书院山长查咸勤读佛

经;中年刘熙载虽中进士并入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又授翰林院编修,但一直忧郁不得志,其生活窘迫,曾侨居长春禅寺,甚至请假客山东、河北、山西,授徒自给。这些人生经历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也都有一定的影响。

然而,如果我们阅读刘熙载的全部作品,考察刘熙载受佛老思想影响诗文产生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些诗文多作于他中年宦游阶段,所记亦多为此前之事,如《查芙波先生借梵书》、《梦受丹经》等。晚年刘熙载,在经历了英法联军入侵和太平天国战乱,以及广东学政由赴任到离职,特别是赴上海任龙门书院山长以后,则完全是一位“粹然儒者”的形象。

刘熙载非常强调学者“要识得经文本旨分晓”,“多读先正”、“以穷经为主”。即使是在其谈文论艺的时候,也处处突出《六经》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宗经思想。其《艺概·文概》开篇即言:“六经,文之范围也。圣人之旨,于经观其大备。其深博无涯涘,乃《文心雕龙》所谓‘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以他论韩愈诗文为例。他在论韩愈文时说:“论文或专尚指归,或专尚气格,皆未免著于

收稿日期:2013-05-28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DAA080079)

作者简介:徐林祥(1956-),男,江苏兴化人,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史,教育史,语言学史研究。

一偏。《旧唐书·韩愈传》：“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二语，推韩之意以为言，可谓观其备矣。”在他看来，《六经》为一切文章之首，统摄着所有类型的文章；论文须从思想内容与风格形式两方面入手，而思想内容方面仅拈出“经、诰之指归”便足矣，也即以《六经》为标准。他在评韩愈诗时也说：“诗文同源。昌黎诗有正有奇，正者即所谓‘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谓‘时有感激怨怒奇怪之辞’。”在《六经》当中，刘熙载尤其推崇《周易》中的《易传》。他认为：“制义推明经义，近于传体，传莫先于《易》之《十翼》。”“以《易》道论诗文”是刘熙载谈文论艺的基本特点。^[4]

刘熙载主讲上海龙门书院期间，曾将他的教学笔记编定为《持志塾言》。其《叙》云：“孟子始言持志。志之赖于持也久矣。持之义不一端，大要维持之欲其正也，操持之欲其久也。持之之方，亦不一端，大要善其志之所以养也，慎其志之所以发也。每念古人之学，无不以此为兢兢，而即可准此以见吾人之失，故余之教于塾也，尝以‘持志’二字额其斋焉。塾中讲贯，自圣贤经义以及先儒格言，固皆曰有课程矣。其有不及举古人之辞，但自言之，以取易明者，则随时笔而存之，盖以便学者之复习也。”刘熙载自称：“其为学与教人，以迁善改过为归，而不斤斤为先儒争辨门户。”《清史稿·儒林传·刘熙载传》记其尝戒学者曰：“才出于学，器出于养。”又曰：“学必尽人道而已。士人所处无论穷达，当以正人心、维世道为己任，不可自待菲薄。”

晚年刘熙载在谈到佛老对自己的影响时说：“余之少也，学不知道，虽从事于六经，然颇好周秦间诸子，又泛滥诸仙释书，并骚人辞客之悲愁放旷、惜衰暮、感羁旅者，亦未尝不寓目焉。故当时所作，指趣多所出入，且有傲然自得而不知其非者，岂非沈溺之甚也哉！四十后乃始悔之。”《昨非集·序》又说：“忆余自始学以来，知圣贤之道不易明，欲从他道参验之。至如阴阳道释之言，苟有明之者，必竭诚以问，不惮再三焉。”其作品集取名“昨非”，即出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觉今是而昨非”。其同乡李详在《融斋类稿四句集叙》中也称其四十以后：“颇有悔少年立言，微露亢厉，又多以禅悦为味，虑为世所诟病，大加芟薙，尽摧其牙距而后已。”^[5]

刘熙载在赴上海龙门书院前即与陈广德、倭

仁、郭嵩焘、胡林翼、莫友芝、丁果臣、林昌彝、陈澧、邹伯奇等人交游，到上海龙门书院后，又与应宝时、莫友芝、齐学裘、吴大廷、俞樾、方宗诚、张文虎、曾国藩、萧穆、涂宗瀛、冯焌光、严芝楣、蒯光典、范当世等人交往。刘熙载的思想倾向，亦可从时人的评论中见出。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三十七《敬举贤才，力图补救疏》称刘熙载“贞介绝俗，学冠时人”。陈澧《东塾集》卷三《送刘学使序》称：“先生之醇德清风，人尽知之。先生之硕学，则知者寡矣。若其意趣高出于一世，远侔于古人，则知者益寡，有相与愕眙焉耳。学政一官，世人所艳羨也。先生为之未几，告病而归。盖世之人皆好进，而先生独好退，不知美官厚禄之可羨，而惟知读书，此古之君子，而澧以得见为幸者也。每一相见，论九流诸子之学，谈声音度数之艺，与澧有同好焉，信可乐也。”方宗诚《柏堂集外编》卷九《答刘融斋中允》云：“承示《持志塾言》，笃实精切，气象极似胡仁仲、胡敬斋诸先生，具见用心。”又方宗诚《柏堂集余编》卷四《沪上观摩册跋》云：“融斋性笃行恭，恪守宋儒之学。”萧穆《敬孚类稿》卷十二《刘融斋中允别传》中称之“洁身修行与有宋诸儒言行相为表里”。陈广德跋刘熙载《昨非集》云：“文以质有其内为难，此盖存乎养之所至，弗可强焉。余与融斋刘子交逾四十年，其人粹然儒者，文亦如之。”《清史稿·儒林传·刘熙载传》称其：“自少至老，未尝作一妄语。表里浑然，夷险一节。主讲上海龙门书院十四年，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

笔者以为，晚清学者刘熙载，对道、释感兴趣，对其进行研究，乃至在一些作品，主要是在他早年、中年的诗文中表现出道、释的影响，都是很正常的；然而，就刘熙载一生的主要思想倾向而言，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儒家思想，特别是他晚年在上海龙门书院的著述和教学实践，更多地表现出儒家“圣贤之道”的影响。

二、刘熙载的政治态度

关于刘熙载的政治态度，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的影响，论者大多给其贴上“封建”、“守旧”、“抱残守阙”的标签。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刘熙载从思想到行动完全站在抱残守阙的封建主义营垒内部。因此，他的著作在政治思想方面，没有多少积极可取的因素，他的文艺思想也不例外。”^[6]“和

当时即将兴起的新潮,又显出了多么大的时代差距”,“属于那个时代的守旧派”。^[7]“刘熙载属于儒家正统国粹派,思想比较保守”,“他在政治上谨小慎微,闭口不谈时政,对当时现实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一概沉默不语”,“在政治态度上,他不赞同学习西方国家先进思想和技术……属于儒家正统国粹派,思想比较保守”。^[8]

但是,如果我们对刘熙载一生的所作所为作一番梳理,就不难发现,受近代社会变革的影响,在晚年刘熙载身上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儒家“封建”、“保守”、“抱残守阙”的一面,而是儒家学者与道、释消极遁世观相异趣的积极的入世观、致用务实的精神和修己安人的社会理想。

这种思想倾向,在他的《持志塾言》和《古桐书屋札记》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他反复强调,“有益生人之用,方可作为才”;“道须有益于生人之用,乃与自私自利者有别。昌黎《原道》大旨,括于一‘公’字。儒家既见得佛老不公,岂可复自蹈之?”“体不立则用不行,而非用要无以见体”;“人外无道,道要在人上尽;事外无理,理要在事上尽”;“夜行者以火照路,照路只为行路起见。学或务知不务行,与照路而不行何异?”“学者徒慕圣人之名,必至侈著述而略躬行”;“读书贵有实用”;“学以躬行为本,躬行以慎独为本”;“知百而不能行,不如知一而能行。”

这种思想倾向,甚至可从他谈文论艺的著作中窥见。比如:光绪年间士人上书言政惯以汉代贾谊、南宋陈亮为标榜,而刘熙载笔下对贾谊、陈亮二人评价均佳,尤其以“有先秦遗意”的评语称道贾谊的文章。他说:“贾生谋虑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经制之文,非经生所能道。汉臣后起者,得其一支一节,皆足以建议朝廷,擅名当世。然孰若其笼罩群有而精之哉!”又说:“陈同甫文箴砭时弊,指画形势,自非出于用者比。如《四上孝宗皇帝书》及《中兴五论》之类,是也。特其意思挥霍,气象张大,若使身任其事,恐不能耐烦持久。”再如:刘熙载充分肯定士人言论著述中的个人独立意识,所谓“周秦间诸子之文,虽纯驳不同,皆有个自家在内。后世为文者,于彼于此,左顾右盼,以求当众人之意,宜亦诸子所深耻与”。又如:他对士人“出处之道”的阐释:“志于隐,志于仕,皆不可谓之立志。盖此乃志于境,非志于道也。君子之志,惟欲随在尽所当尽而已。”表达了一种士者无

论“出处”,“随在尽所当尽”,即为“志道”的见解。

刘熙载曾自称“于古人志趣,尤契陶渊明”。对此,有必要稍作分析。萧统《陶渊明集序》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朱熹《晦庵诗说》亦指出:“陶渊明诗人皆说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来。”笔者以为:陶渊明并没有真正超然,刘熙载心契陶渊明,也没有真正的超然。如同刘熙载评论李白时所指出:“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者,有为言之也。屈子《远游》曰:‘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使疑太白诚欲出世,亦将疑屈子诚欲轻举耶!”

刘熙载诗云:“世人在俗慕得仙,得仙还被俗虑牵。”事实上,刘熙载始终为“俗虑”所牵挂,始终以迁善改过、匡时救弊为己任。其《答陈茂亭二首》诗云:“古人诗咏志,后乃竞瑰奇。但识风骚义,无非忠孝贤。商歌齐相奋,梁甫汉臣悲。遗烈今犹仰,空言尔肯为!”正因此,他“平居尝以‘志士不忘在沟壑’、‘遁世不见知而不愠’二语自励”。他曾说:“学求尽人道而已。”他把治学与尽人道结合起来,努力做到学以致用,这是与一些封建士大夫中的狂客与腐儒迥然不同的。正如他的《李杜》诗云:“太白岂狂客,少陵非腐儒。腐狂援自托,论世为长吁。”他认为狂客和腐儒,仅是李白、杜甫自托而已,实际上他们是感叹时事、经世致用的人。这不仅是为李杜辨白,同时也是刘熙载本人的心灵写照。

刘熙载说:“学以躬行为本。”又说:“人无时无地不在行之中。”其友人俞樾《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记其身体力行:“视广东学,一介不苟取。诸生试卷,无善否毕读之同。或曰:‘次艺可无阅。’君曰:‘不观其全,而谓吾已得之,欺人乎?自欺也。’试毕,进诸生而训之。作《怨忿》、《窒欲》、《迁善》、《改过》四箴以示之。其主讲龙门历十四年,与诸生讲习,终日不倦。每五日必一一问其所读何书,所学何事,讲去其非而趋于是。丙夜或周视斋舍,察诸生存否。其严密如此。”其弟子胡传《钝夫年谱》记其教育弟子:“为学不专在读书伦常之地,日用行习之间,事事准情酌理而行,便是真实学问”;“为学当求有益于身,为人当求有益于世。在家

则有益于家，在乡则有益于乡，在邑则有益于邑，在天下则有益于天下。斯乃为不虚此生，不虚所学。不能如此，即读书毕世，著作等身，则无益也。”^{[9]474}他要求弟子以所学淬沥各人的道德，进而由一己的修身推之于治国平天下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刘熙载主讲龙门书院期间，与洋务派官员如郭嵩焘、应宝时、冯竹儒、李勉林等人有着密切的联系。《郭嵩焘日记》即有1876年出国前在上海“见竹儒及刘融斋前辈”、1879年回国后“诣刘融斋畅谈”等记载。^[10]刘熙载甚至还亲自撰写了一些鼓吹实学、推行洋务的时文。笔者收藏的薛福成编《新政应试必要初编》即收有刘熙载的《机器开矿不用人力策》一文。同时收入该书的还有张文虎的《格致释器总论》、罗泽南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曾国藩的《中国宜设船坞论》、彭玉麟的《论中国易于富强》、张之洞的《中国宜仿新学说》、傅云龙的《西洋诸国导民生财说》、郑观应的《开平煤矿事略》、黄钧宰的《中国建造船坞以何地最善论》、李提摩太的《中国铁道议》等。

三、刘熙载的学术贡献

据《辞海》介绍：“刘熙载（1813～1881），清文学家。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江苏兴化人。道光进士，官至左春坊左中允，广东学政。后主讲上海龙门书院。撰有《艺概》。也能诗词，有《昨非集》。”

平心而论，刘熙载作为文学家是得到学人认可的。其《艺概》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又一部通论各种文体的杰作。该书通过“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的方法，用十分简练的语言，分别论述了古典诗、词、曲、赋、散文，以及书法等的历史流变、创作理论和鉴赏方法，提出了不少启人心智的真知灼见。该书问世后即受到好评。谢章铤《赌棋山庄集·词话续编》卷三：“余于沪读书肆，得兴化刘融斋（熙载）所著《艺概》，后晤同年吴桐云（大廷）观察，为言融斋掌教书院，善于谈艺，盖穷年积学之士，惜匆匆归来，未及见也，《艺概》自诗、文及经义皆言及，中有《词曲概》，虽或为古人所已言者，抑言之而或有可商者（如谓晚唐、五代为变调，元遗山集两宋之大成，予皆不能无疑），而精审处不少，不可废也。”谭献《复堂日记》已

卯年（1879）记：“阅刘融斋《艺概》七卷。朴至深远，得未曾有。”丁亥年（1887）记：“读刘融斋先生《艺概》、陈兰甫先生《东塾读书记》，如饮醍醐。”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记：“得萧敬夫上海书，寄刘融斋先生《持志塾言》、《艺概》至。云《塾言》，刘氏口口意之书。亟读终卷，言言纯实，与《绎志》、《读书记》详要互证，承学之津梁也。”光绪二十七年正月记：“两日温《艺概》。刘先生言一字一珠，不独四方导师，亦千载导师也。”冯煦《蒿庵论词》卷四：“兴化刘氏熙载所著《艺概》，于词多洞微之言。”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七“刘融斋论词精当”条云：“止庵而后，论词精当，莫若融斋，涉览既多，会心特远，非情深意超者，固不能契其渊旨。而得宋人词心处，融斋较止庵真际尤多。”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近时兴化刘熙载论词，颇有合处，尚不染板桥余习。”江顺贻《词学集成》卷五：“刘熙载《词概》论各家词，多中肯綮。”王麀纶《珠光室诗话》卷五也称刘熙载《艺概》：“论诗论文者融合古今，独有卓识。”王国维《人间词话》多处引用刘熙载《艺概》，并大加赞赏。如：称道刘熙载评周邦彦、史祖达“周旨荡而史意贪”之语“令人解颐”。又如：转述刘熙载论南北宋词风之区别时引刘熙载语“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沈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并说：“可知此事自有公论。”《艺概》广为流传更是确立了刘熙载在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就文艺理论批评而言，刘熙载还著有《游艺约言》。“游艺”取义于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内容与《艺概》相类，以札记形式，谈文论艺，主要论诗文、书法。此外，还有在《持志塾言》等书中的相关论述。当今时代，任何一个从事西方文学理论或浪漫主义文学或文论研究的学者大概都不会不知道艾布拉姆斯这个名字，尤其是他的经典性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11]，这本书自1953年出版以来就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重印，广为东西方学者们所引用和讨论。艾布拉姆斯把两个常见而相对的用来形容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做外界事物的反映者——镜，另一个则把心灵比做发光体

——灯。前者概括了从柏拉图到 18 世纪的主要思维特征；后者则代表了浪漫主义关于诗人心灵的主导观念。遗憾的是：许多从事文艺学研究的人却不知道刘熙载 1867 年完成的《持志塾言》说过这样的话：“镜能照外而不能照内，能照有形而不能照无形，能照目前、现在，而不能照万里之外、亿载之后。乃知以镜喻圣人之用心，殊未之尽。”“人之本心喻以镜，不如喻以日，日能长养万物，镜但能照而已。用异，则体可知矣。”比较艾布拉姆斯的“灯喻说”与刘熙载的“日喻说”：灯与日作为发光体，二者是相同的。但是，灯只能照一时，日却能照古今；灯只能照一隅，日却能照万里之外；灯只能发出光亮，日却能长养万物；灯只能依靠外来能源，总有熄灭的时候，日却能生生不息，发出恒久的光辉。概言之，“灯”只是被用来照明的，它与被照之物是二分的；“日”虽然也有照明的功能，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与被照之物同为宇宙的组成部分。刘熙载认为：“赋家之心，其小无内，其大无垠。”如果说，刘熙载是在物我两化中整体观照宇宙的话，那么，艾布拉姆斯则在主客二分中审视着宇宙。这便是“日喻说”比“灯喻说”更高明之处。

然而，刘熙载的学术贡献还不止于此。刘熙载的研究的领域涉及经学、文艺学、文章学、语言学、教育学，甚至数学、天文学等方面。刘熙载晚年在上海龙门书院讲学期间，整理教学随笔成《持志塾言》上下卷，总结治学心得成《艺概》六卷、《四音定切》四卷、《说文双声》上下卷、《说文叠韵》四卷，删定文稿诗作成《昨非集》四卷，自同治六年（1867）至光绪五年（1879）先后刊行，并汇刻为《古桐书屋六种》（《刘熙载六种》）。遗书有《古桐书屋札记》、《游艺约言》、《制义书存》，刘熙载去世后，由其子及其弟子结集为《古桐书屋续刻三种》，于光绪十三年（1887）刊行。其中：《艺概》与《游艺约言》属于文艺理论著作；《四音定切》、《说文双声》与《说文叠韵》属于语言学著作；《持志塾言》与《古桐书屋札记》属于教学笔记；《昨非集》与《制义书存》属于诗文创作。刘熙载还著有数学论文《天元正负歌并序》（《昨非集》卷二），天文学论文《星野辨》（《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卷十四）、《春秋朔闰日食考》序（宋庆云

著《春秋朔闰日食考》，同治十二年刻本，南京图书馆藏）等。

刘熙载尝戒学者曰：“真博必约，真约必博。”（《清史稿·儒林传·刘熙载传》）其弟子沈祥龙《乐志移文录》卷四《左春坊左中允刘先生行状》说：“先生所著书：曰《持志塾言》，皆平日所心得书以训及门者。曰《艺概》，分文、诗、赋、词曲、书、经义六门，而评论其源流体制法度，意多创获。曰《昨非集》，则所撰《寤崖子》及古文诗词也。先生之友陈君广德谓博涉借喻，理实以精，气和以直，非为己慎独者不能为。又悟切音法，惟欵意乌于能统一切字音。欲知字音开口、齐齿、合口、撮口四呼之别，必以此四音试之乃定，因著《四音定切》四卷。又谓许氏《说文》虽未有双声叠韵之名，然就‘江’、‘河’二字言，‘江’、‘工’双声，‘河’、‘可’叠韵，由此以推知双声叠韵即具于古人制字之初，因著《说文双声》二卷、《说文叠韵》三卷，皆刊以行世。”其好友俞樾《春在堂全集》杂文四编三《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云：“自六经、子、史外，凡天文、算术、字学、韵学及仙释家言，靡不通晓，而尤以躬行为重。”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称：“同光间，一时称大师者三人，曰兴化刘熙载融斋、番禺陈澧兰甫及王闿运。”^[12]张舜徽在《清代扬州学记》中曾将扬州学派的特点概括为“通”^[13]，并指出：“扬州学者们总的治学方向，是走上‘通博’一途。但是他们的‘博’之中，还有各人的‘约’。”^[13]¹⁵作为扬州学派故乡走出的学者，刘熙载深受乾嘉扬州学人的影响，也表现出既“通（博）”且“约”的特点。

四、刘熙载的教育实践

刘熙载毕生事业主要在治学与教学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身兼学者与导师。其早年求学阶段与晚年讲学阶段固然如此，即使是其中年宦游阶段，亦主要是从教。他晚年在《寤崖子传》中写道：“仕皆师儒之位，自其为诸王师，为太学师，与夫在乡塾为童子师，客游为远方士子师，出处不同，而视之未尝不一也。”

同治六年（1867）初，刘熙载接受苏松太兵备道应宝时（敏斋）聘请，来到中国开埠最早，也是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的城市——上海，出任龙门书院院长。“院中肄业诸生，定额三十人。

每岁仲冬，例由观察甄别其课程。”^[14]“课以经史性理为主，而辅以文辞，尤重躬行。人置行事日记、读书日记各一册，每日填记，逢五、十日呈请院长评论，每月十三日院课。”柴萼《梵天庐丛录》卷十七记：“每午，师生会堂上，请益考课，寒暑无间。诵读之外，终日不闻人声。有私事乞假，必限以时，莫敢逾期不归。刘先生主讲最久，士论尤协。途遇学徒，望而知为院中人也。”刘熙载弟子姚文枬撰《民国上海县续志》卷十八称其“主讲龙门书院历十四年，严课程，勤讲贯，以身为教”。直至光绪六年（1880）七月刘熙载病重，由江南制造局小火轮船拖带刘熙载所乘之船回故里兴化。

创办于同治中兴时期的龙门书院，其主办者希望通过恢复“经义”与“治事”传统，造就“明体达用”的人才。应宝时《龙门书院记》：“凡肄业者，必先从事于《小学》、《近思录》，以正其志趋，后及群籍，以备考索。故凡经史诸书悉购置焉。又书《朱子白鹿洞规》于堂，俾日见之，以资警省。月课性理、策论，期有合于胡安定经义、治事立斋之意。故不以举业、诗赋列入课程。有志之士自亦不欲以遇合之心，夺其学问之实也。……从来学者，必先品行，次及文学。学术事功，原委有序。此在诸生，当早慎之。况地属濒海，中外杂处，闻见易纷，砥柱中流，尤须正学。诸生诚能逐其学力，养其德器，以上答国家兴贤育才之意，将于斯世必有济焉。”以1868年入学试题为例：首题“涵养吾一论”，次题“拟答日本长崎岛来书”，诗题“沙船叹，不拘体韵”。^{[9]476}可见，龙门书院从初创之时就与旧式书院迥然有别：旧时书院强调的是举业、诗赋、遇合之心、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而龙门书院强调的却是正其志趣、遍及群籍、学问之实、国家安危、黎民福祉。

上海龙门书院有着独特的日记教学法。笔者在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查得刘熙载龙门书院弟子陈宗彝撰有龙门书院手稿共48册。其中：同治戊辰（1868）仲春望日始记《龙门书院日记》2册，同治戊辰年（1868）闰四月初一至光绪六年（1880）六月初八日记《龙门书院读书日记》21册、《龙门书院行事日记》22册，另有《龙门书院日程》2册、《制义文》1册。陈宗彝的手稿恰好与刘熙载主讲龙门书院的时间重合，是为刘熙

载与龙门书院研究的重要文献。《龙门书院读书日记》每页天头均印有如下红字：“读书先要会疑，又要自得。张子曰：‘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又曰：‘心中有所开，即便札记，不思，则还塞之矣’。”《龙门书院行事日记》每页天头均印有如下红字：“行事当敬以胜怠，义以胜欲。敬怠、义欲须于举动时默自省察。所行必求可行，不可记者即知必不可行，记必以实。司马文正言：‘诚自不妄语始’。”《龙门书院日程》每页天头均印有如下红字：“敬怠，要合身心内外自省，先在持之以庄。义欲，要在念虑上加察，先在一其心志，力去妄念。功课，贵在整饬，不得间断，当以有恒有渐为方。”《龙门书院日程》每页除“月”、“日”外，有“晨起”、“午前”、“午后”、“灯下”四节，分“敬”、“怠”、“义”、“欲”、“功课”五项，左侧书有“其敬义二项，须于身心举动之间，时时以怠欲自检，逐时标记”，“右课程格式，诸生每日按候填写，务以不欺为主，忠信之要”。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同时还收藏有刘熙载龙门书院弟子宗廷辅同治七年（1868）撰《龙门书院读书日记》2册、《龙门书院行事日记》1册手稿。此外，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收藏有刘熙载龙门书院弟子沈祥龙《乐志箴笔记》四册（光绪辛丑春锲云间沈氏刻本），内有《吾园日记》上、下二卷。其序云：“祥龙师事兴化刘先生十四年，读书吾园（龙门书院园名）。先生谆谆垂教，命按日札记，而承指示，久之积成数巨册。今春先生归道山矣，提携诱掖，从此无人，追忆往训，曾未遵闻，行知能无愧悔？爰取曩日所记，择其什之一二，录分两卷。自今以往，苟力勉焉，而自践其言以期稍寡尤悔，庶不负先生之教乎？不然，能言不能行，恐终为小人之归耳！光绪七年仲冬之月。”同乡李详称刘熙载“已中风矣，犹阅诸生日记”。^[15]

龙门书院要求诸生日记的做法在当时就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上海广方言馆即借鉴了龙门书院这一做法。据《广方言馆全案》载：同治九年（1870）三月初三日《总办机器制造局郑冯上督抚宪禀》所附《计呈酌拟广方言馆课程十条》，“考核日记”即为其中之一。该课程要求“兹拟照龙门书院课程，设立课书行事日记二本，诸生按日登记，于课文之后三日，送交先生考核”^[16]。刘熙载龙门书院弟子胡传之子、现代著

名学者胡适对此评论道：“父亲对这位了不起的刘山长的教学方式也有所记载。他说所有在书院中受课的学生，每人每日都得写一份‘日程’和一份‘日记’。前者记载为学的进度；后者是记学者的心得和疑虑。为这种‘日程’和‘日记’的记述，该院都有特别印好的格式，按规格来加以记录。这些‘日记’和‘日程’父亲均保留下来。其中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这印刷品的卷端都印有红字的宋儒朱熹和张载等人的语录。其中一份张载的语录便是：‘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是个完全中国文明传统之内的书院精神。”^{[17]23-24}

龙门书院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经世致用的人才，其中有政治家袁昶、教育家张焕纶、地理学家胡传、史学家葛士澹、外交家姚文栋、社会活动家李平书、文学家沈祥龙、数学家刘彝程等。他们以救国为主旨，身体力行，成为同光时期社会的精英人物，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其影响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18] 龙门弟子成才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其报国的途径同样是多种多样的，使笔者感兴趣的是：他们的人生经历中都带有龙门书院的烙印。刘熙载的汉宋兼治、言传身教造就了他们以宋学明心见性、砥砺气节为根底，以汉学实事求是、缜密考证为入手的功夫，使他们既有深沉的爱国情怀，又有扎实的学术根基。融斋龙门弟子正是在刘熙载这位“品学纯粹，以身为教”的儒家学者经世致用思想的教导下，从“英才济济”的龙门书院走向社会的。“名师益友砥砺期许，不敢相负！”^{[19]13} 李平书在晚年回忆龙门书院时说的这句话，道出了融斋龙门弟子的共同心声。正因此，他们对刘熙载与龙门书院怀有特殊的感情。袁昶称：“生平服膺兴化刘融斋先生，终身不衰。”^[20] 胡传每次到上海都要到龙门书院拜访老师，其宗祠楹联亦请刘师撰写。^{[9]478} 刘师患病，回籍养病，其弟子“送至江干，皆依依不能舍，同学有送至兴化者。盖刘师道德入人之深，其感化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焉”；“得刘师噩耗，同学设位于后廊，素服哭临，有失声者，乃稟鲍师设栗主，朔望于朱子位前拈香毕，至刘师位前行礼”。^{[19]16} 此后，“龙门诸弟子公建祠于松江郡城。郡守陈适声就祠旁建融斋书院，以志不忘”。

作为一代名师，刘熙载的为人品格与他通变

务实的思想、怀疑批判的精神、不存门户之见的气度等等，不仅影响了他的学生，甚至是学生的子孙后代。他的学生胡传及其子胡适即是一例。胡传的为人学深受刘熙载的影响。胡传称：“先生（刘熙载）教人学程朱之学，以穷理致知、躬行实践为主，兼及诸子百家，各取其所长，毋轻訾其所短，不许存门户畛域之见。”^{[9]468} 胡适也称：“由于业师刘熙载先生的教诲，我父亲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也很大，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在大清帝国内当时所流行的宗教，予以严肃的怀疑与批判。”^{[21]26} 唐德刚甚至认为：“刘熙载尝戒学者曰：‘真博必约，真约必博。’这也就是胡适所谓‘为学当如金字塔’之意。胡氏治学对我国传统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刘熙载要求弟子学宋儒“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正是胡适之治学终生奉为圭臬的格言。^{[17]26}

刘熙载以其在龙门书院的教育实践应和了中国近代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他主张的“人外无道，道要在人上尽，事外无理，理要在事上尽”，既包括了践履笃行以求德性，也含有不应空谈学理，而须以事尽理，沟通修身与治事为一体的意思。由此出发，构成了刘熙载对于经世致用的新思潮的理解和积极倡导，加上刘熙载本人的躬行实践，对于当时渴望求学以经世的士子们形成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曾国藩评论龙门书院时说：“不独沪上浮靡之风为之一变，即遐迩志士，亦当闻而兴起。”^[21] 因士子欲入龙门书院而名额有限，以致 1872 年上海道台沈秉成仿龙门书院设立诂经精舍。同治十二年二月十九日《申报》载文《论沪新设诂经精舍》评论说：“沪城书院固不一，而自龙门以外，率以制艺为宗，间及诗赋，无有以经史切磋者。又地为通商巨埠，五方辐辏，士多寄籍，于是即欲肄业龙门，而额隘殊难容众。是以今观察沈公，有诂经精舍之建……其课士不尚诗文，专讲经史。……惟此六经三史之精，实经济文章所自出，故以此嘉惠士林耳。”稍后王韬在《格致书院课艺·戊子卷》序言中也称赞：“龙门、求志各书院课士无不以实学。”据《民国上海县续志·风俗志序》记载：“同治中叶，大乱初平，当道注意教育，主讲席者，皆当代硕儒，士风丕变，咸知求有用之学，不沾沾于帖括。当时以广方言馆、龙门书院为盛。”柳诒

徵撰《江苏书院志初稿》称：“以砥学砺行得士称盛者，曰龙门书院。”“龙门之山长，以刘熙载主讲最久。其德学均为学者所推服。”^[22]刘熙载龙门弟子，与广方言馆学子一样，或成为中央、地方的能吏，或成为推广新学、兴办实业的先驱，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自觉变革图强的求索精神，在实际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突破坚冰、开辟航路的作用。^[23]

笔者认为：在晚清扬州学者刘熙载诞辰 200 周年的今天，有必要重读刘熙载，重新认识刘熙载的主导思想、政治态度、学术贡献和教育实践，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评价刘熙载学术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参考文献：

[1]李长之. 刘熙载的生平及其思想[M]//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论资料编选组.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683.

[2]李德仁. 刘熙载美学思想与道家影响[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1):11-15.

[3]詹志和. 好借禅机悟“文诀”:佛学对刘熙载文艺美学观的影响浸润[J]. 文学评论,2006(1):99-105.

[4]徐林祥. 论《周易》哲学对刘熙载美学思想的影响[J]. 西北师院学报,1987(3):73-78.

[5]李详. 李审言文集[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894.

[6]敏泽. 形象·意象·情感[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188-189.

[7]赵敏俐. 十九世纪末古典文学研究态势的历史回顾[J]. 江海学刊,1996(1):171-175.

[8]薛正兴. 刘熙载文集·前言[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4-5.

[9]胡适. 胡适文集:第1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0]郭嵩涛. 郭嵩涛日记:第3卷[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64-65,824.

[11]艾布拉姆斯. 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 郗稚牛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2]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M]. 长沙:岳麓书社,1986:69.

[13]张舜徽. 清代扬州学记[M]. 扬州:广陵书社,2004.

[14]王韬. 瀛壖杂志[M]. 台北:广文书局,1969:53.

[15]李详. 李审言文集[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894.

[16]广方言馆全案[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21.

[17]胡适. 胡适口述自传[M]. 唐德刚,译注.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8]徐林祥. 融斋龙门弟子与中国早期现代化[J]. 史林,2006(5):30-43.

[19]李平书. 李平书七十自叙[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0]吴士监. 袁忠节公遗札·跋[M]. 国家图书馆藏影印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

[21]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书信(9)[M]. 长沙:岳麓书社,1994:6476.

[22]赵所生,薛正兴. 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册[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72-74.

[23]徐林祥. 刘熙载及其文艺美学思想[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2-33.

Liu Xizai's Though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Others

XU Linxiang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writing and teaching of Liu Xizai, a scholar in late Qing Dynasty, in Shanghai Longmen Academy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on him. The dominating thoughts of Liu in late years can be generally summed up with the positive worldview of Confucian, practical spirit as well as the social ideal of self-improvement and helping others get established. Liu's academic researches involve Confucian classics, literature and art, linguistics, education, and even mathematics and astronomy.

Key words: scholar in late Qing Dynasty; Liu Xizai; Shanghai Longmen Academy

(责任编辑 丛 琮)